

从认知带宽到价值带宽： 元宇宙视域下认知竞争逻辑的重塑

喻国明 苏芳

[摘要]媒介社会中,认知带宽表征了个体稀缺的认知资源,认知竞争则提出个体有限认知条件下的信息分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展开了媒介信息供给与用户信息接收的两个主体。媒介对用户有限认知的争夺形成了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而这一逻辑也面临异化为“认知战”的风险。为解决媒介信息供给与用户接收的矛盾,本文从个体生理带宽、认知带宽与媒介的中介化互动着手,立足于当下为元宇宙时代人脑认知的延展与高连接度的媒介提供理论启发。在4E认知的观点下,以身体与空间为阐释对象,论述元宇宙下个体认知与媒介在感知空间、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中的协同关系,以期实现个体的积极认知并解放人类行为。

[关键词]元宇宙;认知竞争;生理带宽;认知带宽;价值带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3)04—0139—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究”(20JJD86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神经传播学、传媒经济学、舆论学;苏芳,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神经传播学、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媒介社会中认知资源的有限性与信息无限性的矛盾

(一)媒介环境的内爆与个人心理

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内爆”(implosion)以及符号的过载,这种过载的信息和符号资源与个体有限的认知资源相结合,一方面使得个体依赖于媒介的逻辑形成认知,规训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按照媒介化的逻辑重构与再组织。麦克卢汉基于对媒介技术的进化的考察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1](P.20)}的观点,新媒体技术产生会形成新的认知与思维方式,由此形成认知尺度与认知环境,从而对人的心理机制与社会产生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内爆”的观点,机械时代人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人的中枢神经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1](P.20-21)}并且这种身体上的延伸对整个心理以及社会复合体都产生了影响。

内爆的观点强调了“反环境”(anti-environments)^{[1](P.28-29)}和“时空感的悖论”^[2]。具体来说,媒介内爆带来了时空界限的模糊,时间的加速与空间的多重性,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脱域”的特点。时空的同步性与异步性并存也带来了“反

环境”,即对我们所处环境本身的认知。电力技术下“反环境”的功能使得个体产生了时空感的悖论,时空的急剧压缩一方面使得个体承受着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运转的加速,如信息流的加速和过载。

(二)个体有限的带宽形成内爆后的困境

媒介产生于人们对于信息的需要,媒介起到了延伸、替代人感官的作用,并且通过感官形成的中介化体验会进一步作用于人的认知与行为。从媒介的结构与功能来看,人与媒介产生互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有限的生理和心理认知能力。随着人机交互、技术身体、智能身体的引入,技术逻辑已经渗透进日常媒介实践当中,用技术的术语来看,个体有限的的能力可以概括为“带宽”(bandwidth)。在数字设备中,带宽指单位时间能通过链路的数据量。通常以bps来表示,即每秒可传输之位数。

在生理层面,有学者提出生理带宽的概念,用它来隐喻媒介争夺用户有限的身体、感官、时间和注意力。^[3]在此处,我们将用户的生理带宽主要界定为人们有限的身体感官体验。生理带宽是在这种具身交互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是从具身的角

度考察媒介与人的感官体验。个人的生理带宽与媒介的关系具有依附性的,囿于自然的限制人的感官需要依托媒介来进行,基于媒介获得的体验也在作用于个人的身体、心灵和认知。

在心理学中个体有限的认知资源也被理解为认知带宽(cognitive bandwidth)。认知带宽概括了个人有限的认知资源,指的是信息处理的可用性,以及个体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能力。行为经济学家穆来纳森和心理学家沙菲尔在《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一书中提到了认知带宽(cognitive bandwidth)的概念,它是一种相对的认知容量,包括两种能力,分别是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带宽的减少会降低“解决问题、保留信息和进行逻辑推理”的认知能力,同时削弱执行控制能力。^{[4] P.15}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将直接决定个体处理信息的复杂性及信息数量。^[5]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注意资源与工作记忆的有限性,“认知带宽”成为媒介信息过载时代的稀缺资源,进而成为不同媒介竞争的目标,虽然个体假设自己可以根据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但是在认知带宽的局限下个体可能将认知资源集中在最为紧迫的需求上,牺牲其他的目标,因此个体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沦为被媒介信息所主导的无意识的大众。

不过,除却客观上信息过载带来的内爆之外,个体主观上超越现实的欲望与需求也可能导致媒介交往中的“自反性沉迷”。即当我们理性有限而行动无限时,人们可能基于生理欲望驱使行动,并在数字媒介交往中不断强化自反性沉迷。这种自反性沉迷可能表现在两个层面:在感性层面上,对媒介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个体心灵危机;而在理性层面上,认知带宽和算法等技术因素可能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进一步导致社会交往的离散化。^[6]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个体认知与媒介信息分配之间的矛盾展开论述。认知带宽描述的是个体认知资源有限,以及有限认知和有限注意条件下的信息分配问题,这一过程包括信息供给方与用

户信息接收方两个主体。而在媒介环境中,媒介日益型塑了不同的空间与场所,并允许个体展开具身传播行为,这些行为背后体现了空间与身体和认知的互构以及文化的渗透。由此从“身体-媒介-认知-空间”的逻辑展开,首先分析个体有限带宽下媒介所形成的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其次,从中介化视角看个体带宽与媒介社会的互构,重新界定传播研究中受众认知的概念维度。最后,从身体与媒介空间的互动的视角出发,思考元宇宙环境中智能技术是否能够摆脱媒介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达成个体的积极认知。

二、中介化视角下个体带宽与媒介的关系:媒介连接与认知竞争逻辑

在个体与媒介的关系中,生理带宽涉及到身体的居间性,认知带宽涉及到身体与认识、心智和意识的互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学者指出,媒介并非是简单的、技术性的单一“延伸”,媒介总是在“居间”,成就的是交互关系。以媒介与人体而言,媒介是人的连接点,人体也是媒介的连接点,展现的是技术与人和世界的关联。^[7]德布雷也认为媒介是一种关系而非实体^{[8] P.73},从关系性的角度来看,不同媒介载体承载了不同形式的交往方式,媒介所形成的竞争逻辑和方式也不同。

(一) 中介化视角下个体带宽与媒介的演进逻辑

媒介成为个体感知体验世界的中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与媒介产生了中介化的互动。“中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指的是两个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在这一过程中传播技术协助了人与人之间中介形态的互动体验,使得时空的距离化(time-space distancing)或时空延展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人们的体验也被介入的技术物所型塑和替换。^[9]中介化也包含了一种辩证关系,即技术与其相应的机构驱使特定的传播形态的同时,这种驱动也受制于历史和社会传统。由此,中介化辩证关系视角能够阐释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交往方式。中介化过程也包括了技术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重维度(见表1)。^[10]

表1 中介化视角下个体带宽与媒介的演进逻辑

| 媒介演进逻辑 | 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大众媒介-电子媒介 | | |
|---------|--------------------------|------------------|------------------|
| 中介化的演进 | 媒介技术性 | 社会性 | 空间性 |
| | 工具-关系-场景 | 直接社会交往-中介化的社会交往 | 物质空间-虚拟空间-虚实融合空间 |
| 生理带宽的演进 | 感官分离-感官融合-感官重塑 | 语言传播-非语言传播-多模态传播 | 身体在场-身体离场-数字身体 |

| | | | |
|---------|----------------------------------|-------------------------|--------------------------------|
| 媒介演进逻辑 | 口语媒介 - 文字媒介 - 印刷媒介 - 大众媒介 - 电子媒介 | | |
| 认知带宽的演进 | 具身认知 - 嵌入认知 - 生成认知 - 延展认知 | 社会身份认同与建构 - 情感 与价值认同 | 直接经验性认知 - 中介化的认知 - 扩展的 想象空间 |

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媒介构成了技术化的交流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媒介的连接属性逐渐从过去的信息传递的工具性连接,转变为型塑社会关系、提供场景互动的中介性连接。在媒介技术的演进下,个体带宽体现出收紧与释放的弹性过程。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与人感官系统的发展是由感官分离到感官融合的过程^{[1] (P.78)}。具体来说,口语媒介时代听觉与视觉被同步释放,而文字媒介时代聚焦于视觉,收紧了其他的感官,这一过程在印刷媒介时代被进一步强化。印刷媒介时代,被强调的文字印刷媒介使得事物被反复思考与审视,人的认知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感官被收紧的同时认知思考空间得到了释放。而在大众媒介时代,广播、电视、电影的产生释放了人们过去被局限的生理带宽,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影响下,大众媒体在影响个体的注意资源、激活情绪情感、影响个体记忆以及建构民族的集体记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电子媒介时代,这种中介化过程超越了距离,表现为时空的脱域和拟真的交往,个体的生理带宽得以进一步融合并被媒介重塑。在认知带宽的维度上,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认知科学对认知的理解也在不断进步,认知科学家认为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嵌入的(embedded)、生成的(enacted)、延展的(extended)和情境的(situated),将心灵看作是大脑、身体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弥合了标准认知科学忽视身体与环境对认知作用的缺陷。^[11]

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媒介的模糊性与矛盾性、物理性、媒介的社交性和媒介伦理起到了中介化的作用。首先媒介的介入使得社会交往从直接的交往过程转变为中介化的社会交往。电子媒介的产生使得同质化的文化生产与分裂化和个性化的网络社会并存。^[12]由此,生理带宽逐渐从过去被媒介局限的部分生理感官,发展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多模态传播方式,进一步对人体感官通道的叠加与融合。多模态话语分析能够为分析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话语权力和身份认同脉络中的权力关系提供可能,体现了其社会性。而在认知带宽的社会性方面,个体的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体现为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

理历程。^[12]从社交的层面来看,卡斯特认为身份认同是人们获得其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13] (P.5)}由此,媒介的中介化的过程强调了不同的身份认同的侧面,例如大众媒介时代的更强调社会身份认同与媒介的建构作用,而电子媒介时代的多模态传播方式更强调媒介所形成的圈层中群体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例如大众媒介时代媒体对“农民工”形象所建构的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中获得文化承认和尊重带来了影响。^[14]而在电子媒介时代,个体的认同更多是由社交媒体提供的圈层关系所型塑的,例如“Z世代”基于游戏社群、知乎社群、豆瓣兴趣小组、哔哩哔哩等媒介所形成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15]

从空间性的角度看,社会空间的变迁从物质空间发展到电子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以及当下VR、AR等媒介塑造的虚实融合的空间。其中生理带宽的变化体现在个体身体的在场到离场,对传播的理解从意识的交往发展到身体的复归。例如,身体以技术的方式跨越时空实现在场,智能传感器通过采集生理信号形成了数字化身体。在认知带宽层面,个体认知从直接的经验性认知转变为被媒介所中介的认知,发展到电子媒介创造出新的时空场景,进一步扩展了个体的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同媒介空间所包含的复杂权力关系通过空间表象影响着个体的认知与情感体验。

(二) 媒介认知竞争效率逻辑的二重性

媒介竞争逻辑也即媒介社会对受众的争夺,其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体态度和行为的转变,而这一前提是认知,由此媒介的竞争逻辑逐渐从对受众行为的竞争转向了对受众认知的竞争。由于个体生理和认知带宽的有限性,媒介的认知竞争就必须遵循效率逻辑,即在个体有限的带宽之下有效地使用信息供给与分发满足个体认知的需要。因此,媒介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也就是通过信息资源配置实现对受众稀缺认知带宽的占有权和认知占有率的最大化。在信息资源过载情况下,实现信息“有效触达—影响认知—规训行为”的闭环,这种认知竞争效率逻辑也体现了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与媒介的干预性。

在认知竞争效率逻辑的正面影响中,基于数

字化和网络化技术捕捉了个人的数据痕迹,实现了高效的信息分发机制。媒介从大规模无差别信息分发到精准化、智能化场景推送,极大地降低个体获取信息的门槛,同时提升了获取信息的效率。例如,信息分发从大规模传输到算法主导下“猜你喜欢”的个性化推送。

不过,媒介的丰富性与连接的多层次导致了信息爆炸与个体心理的“内爆”。这种信息爆炸在个体认知加工过程中表现为信息过载下的认知干扰。从注意资源的层面看,首先,信息过载加速了注意资源的损耗。具体表现为增加注意力残留抑制无关刺激耗费更多努力并且降低了人的警觉性。其次,信息过载损害了注意资源的分配,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型的信息“抢夺”用户的注意资源。最后,从效率的维度看,信息超载引发了信息规避(information avoidance),降低了决策绩效。从工作记忆的层面看,工作记忆受到认知负荷的影响。信息的特征与呈现方式会影响个体决策时的认知负荷,同样信息过载带来的时间压力也会影响个体决策。^[16]例如,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信息过载直接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认知反应和情绪反应^[17],同时信息过载也是社交媒体倦怠的核心决定因素^[18]。

而在这种信息过载与认知负荷的作用之下,个体的信息加工和决策面临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困境,表现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过程中。在自下而上的加工方面,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依据,穆来纳森认为稀缺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捕获注意力,行为的发生不再受到意识的控制。^{[4](P.52)}稀缺会直接减少带宽,此处的带宽并非与生俱来的带宽容量,而是在特定场景下需要运用的带宽容量。同样,前景理论也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提出个体认知决策的确定效应、反射效应、参照依赖、损失规避和迷恋小概率事件。

此外,个体在信息加工中出于急于寻求答案的认知动机也会产生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认知闭合的发生包括夺取和冻结两个阶段,分别反应了个体紧迫和永久的两种倾向。在夺取阶段,个体进行快速的问题搜索形成对目标问题的尝试性假设,在冻结阶段,个体坚持原有假设并且拒绝新的信息调整原有认知,形成认知闭合。^[19]认知闭合一旦形成也会导致个体的认知偏差和认知功能失调,并且会进一步激活情绪和行为的失调反应。^[20]这种信息的不确定性使

得个体获取信息更依赖媒介,媒介的认知竞争逻辑一旦作用于个体决策,个体可能会产生认知闭合,从而影响群体行为决策。例如,谣言、流言与群体行为通常在个体认知闭合的需要下产生,由此引发了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当个体出于不确定时卷入海量、迅捷性的信息海洋中,具身的交互增强了拟态环境,个体的积极认知也就滑向了认知闭合需要。

除却个人因素,媒体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组织也可能导致认知竞争效率逻辑产生异化。媒介可能通过强化认知的首因效应和占优权、最大化认知占有率等方式,使得认知竞争转变为“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例如,在俄乌冲突中,媒介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通过舆论战、信息战和认知战,控制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美国国防部将信息环境分为物理的、信息的和认知的三重维度,即以人为中心的认知维度、以数据为中心的信息维度和可感知的物理环境。认知维度包括“人民的知识、态度、信念和看法”。正如信息战所概括的那样“信息战旨在使用和管理寻求竞争优势的策略,包括进攻和防御行动,通常可以用来描述较狭义的活动,例如网络运营、认知操控、电子战、运营安全和军事欺骗”,信息操控日益从数字信息内化到身体和认知维度。^[21]在此背景下,“认知带宽”这一术语也难以概括媒介背后的权力主体所传递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三、从认知带宽到价值带宽:认知竞争逻辑下个体带宽的匹配过程

当下,媒介认知竞争的维度也从生理带宽到认知带宽再到更深层的价值带宽。而媒介对不同带宽的延展程度不同,生理带宽、认知带宽和价值带宽应对媒介的认知竞争的方式也各具特殊性。

(一) 共同体与信任:价值带宽的引出

在当下媒介环境中,媒介的认知竞争逻辑实际上还包括了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因此,在认知竞争逻辑下的个体带宽还包括个人或群体的精神习惯和思维定式的总和。由此,引出了认知竞争有效触达的最后一环,媒介对目标个体或群体有针对性地匹配知识和信息,影响其决策。这些信息具体包括与个体或群体相关的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经验、人际关系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来自更深层次的受众认知,并且也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的特征,因此“带宽”的隐喻也可以表示个体在媒介环境中有限的认知价值尺度,“价值带宽”

的概念也就由此引出。

“价值带宽”将个体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从个体的经验中抽绎出来,从宏观群体和社会层面探讨认知竞争的维度。价值带宽不仅指受众接受了信息,同时意味着受众接受了信息的标准、规则、结构和内涵等价值属性,换句话说,价值带宽的重塑将对受众的认知结构起到某种程度上的改造作用。分布式认知进一步佐证了认知中“价值带宽”这一概念,Hatch和Gardner就教室中的认知活动提出了分布式认知的同心圆模型(the Concentric Model),该模型包括了三重维度(见图1):最外层的是文化力,代表惯例、活动和信仰,超越了特定的情境,影响着个体;中间层是“地域力”,强调了特定的本地情境中的资源以及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人物;最后是“个人力”,代表个体带到本地情境中的倾向及经验。^{[22] (P. 164-187)}同心圆模型提出的三种维度包括了文化、地域和个体经验对认知加工的影响。换句话说,在个体高度依赖媒介信息的现代社会中,从信息解码到信息匹配再到行为的过程中,价值带宽归纳了媒介信息在社会文化和地域、圈层关系以及个人经验层面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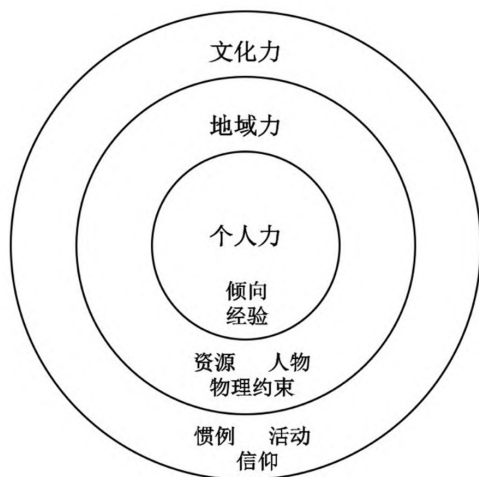


图1 分布式认知的同心圆模型

地域的力描述了地域性的资源等物理因素,媒介社会中的个体并非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存在不同圈群中的个体。因此,认知竞争逻辑下价值带宽的竞争的具体过程是从个体所处的圈层出发,通过地缘、业缘以及技术影响下的趣缘关系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以及情感关系认同,在网络流动化的圈层中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与信任。从当下的媒介环境中看,圈层与价值带宽的关系是一个两种力量的动态平衡过程,一

种力量是单一的、原始的,通过极端价值形成了“封闭的圈层”;而另一种力量则是开放性的,可能导致圈层的过度开放使其失去独特价值。在这两种极端力量的张弛过程中,自由、平等、信任、开放的圈层将是媒介技术需要探索的平衡点。

(二) 绝对带宽与相对带宽: 认知竞争逻辑与个体带宽的匹配

在媒介对个体带宽的争夺过程中,这一过程也是自反性的,伴随着个体带宽的重塑和媒介认知竞争逻辑的重构。德布雷关于媒介的观点也表明,媒介能够型塑个人心理。具体来说,德布雷提出媒介域的观点,旨在阐述技术系统、社会组织 and 象征系统之间如何建立起社会契约的关系,并且在特定的媒介域中,形成与媒介域相匹配的集体心理、信仰和主义。^{[23] (P. 253)}

这种自反性是不同带宽在媒介作用下的匹配或认知折扣的过程,表现在生理带宽的绝对性、认知带宽的相对性、价值带宽的响应性和效率性。在生理带宽方面,绝对性体现在媒介技术的延伸与截除具有一定的生理限度,例如,通过后天的运动训练能够实现生理带宽的适当扩张,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实现数字孪生、分身接触等,在另一空间实现生理带宽的重塑。

在认知带宽方面,稀缺理论下认知带宽具有相对性,认知带宽的重塑主要是与用户的认知结构相关。如前所述,认知结构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认知的不同成分如工作记忆、长时记忆与信息加工匹配存在多维互动,因此在认知竞争逻辑下认知带宽的匹配过程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在认知层面,解决带宽的稀缺问题进而促进信息匹配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在生理层面扩展带宽;其二是实现信息的有效分配,减少认知的结构性盈余。生理层面的带宽扩张是指可以采取多重感知通道的方式对用户实现感官的全方位唤起,降低单一感官在信息接收过程中的损耗。不过,感官通道的多寡与信息接收也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例如信息和感官通道的协同、匹配与场景连接相关。在信息的有效分配方面,信息与认知结构的秩序化是减少信息熵,促进认知接收的手段之一。换句话说,有序信息能够简化认知并且在结构上扩大认知带宽。在认知结构的分配方面,如果外来信息与知觉、注意、记忆、情感等成分的匹配存在不平衡性,就会产生认知的结构性盈余。因此,扩大认知带宽也就意味着信息内容

与认知结构的系统耦合。

最后,在价值带宽的匹配方面,价值带宽涉及到对信息的响应性和效率性。吉登斯认为,在人类暴力和个人无意义的风险环境中,关系与信任成为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纽带。信任能够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可信赖互动形式,促进信息的接收匹配,信任被植于社区、亲缘纽带和友谊的个人化信任关系之中。^{[24] [P. 88-89]} 正如分布式认知的同心圆所显示的,文化力体现了媒介社会中弱关系的作用,地域力则是与个人直接相关的强关系,能够影响个人的认知、态度并且促进行为转变,个人力体现了个人的基本认知结构。格兰诺维特认为,强弱关系之间的区隔体现在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25] 强弱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在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方面发挥的功能不同,认知竞争逻辑中价值带宽的适配也是在解决强弱关系时的结构性匹配。

四、元宇宙时代智能技术与个体带宽的耦合:媒介协同与主体认知自由

媒介技术在型塑个人认知和行为的同时,个

表2 大众传播时代与元宇宙未来媒介时代个体带宽的比较

| | 大众传播时代 | 元宇宙与未来媒介时代 |
|------|------------|-----------------------------|
| 生理带宽 | 物化身体 | 智能身体与多元身份认同 |
| 认知带宽 | 认知带宽有限 | 认知带宽在感知空间、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的三重空间中延展 |
| 价值带宽 | 价值带宽作为外部逻辑 | 价值带宽内嵌于底层架构 |

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是一个包括认知主体和环境的系统,是对内部和外部表征的信息加工过程。^[26] 分布式认知提出,认知分布于个体内、个体间、媒介、环境、文化、社会和时间等之中。^[27] 与传统认知强调个人的主体作用不同,分布式认知的框架提出,在媒介化社会中主体与客体依赖于媒介工具的互动。媒介工具在此处的功能是扩展认知,减少主体的认知负荷,扩展个体的生理带宽和认知带宽,并且健全个体的价值带宽。在分布式认知的框架下,主体与媒介形成了具身的关系,媒介技术的演进下媒介工具从中介化、干预性发展到媒介与主体认知的协同演进。这种协同演进一方面从物理层面扩展带宽,另一方面对认知结构和认知系统中的结构性盈余进行重新分配。

近十年,心智预测加工理论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28] [P. 295]},这一理论强调了知觉与行动的耦合,体现出自我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观点^[29]。当这一过程发生在媒介环境中,实际上就涉及到

人也在以认知可供性的方式驯化着技术。因此,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思考元宇宙环境中人与技术的耦合是否能够摆脱媒介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以达成个体的积极认知自由。

(一) 离身到具身:元宇宙视域下媒介与个体认知的协同

面对内爆,麦克卢汉的观点并非如鲍德里亚一般消极,他认为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偏好的感知和认知模式,倾向于为每个人、每件事规定一些偏好模式。而当下时代人们更厌恶这种强加于人的模式。^{[1] [P. 23]} 这种模式表现为媒介塑造个体的认知模式和价值模式,而个体更渴望获得个人的积极认知自由,形成与媒介的融合共生,而非中介化的互动。基于个人依赖媒介的现实,分布式认知的观点对个人认知的延展以及认知与媒介的协同进化提供了分析框架。在这一观点下,个体带宽与媒介的互动也从大众传播时代的中介化的互动转变为元宇宙空间中带宽嵌入、延展、生成与协同的互动(见表2)。

“信息触达-信息解码-信息匹配-行为决策”的耦合过程,信息触达调用了个体的生理带宽,信息解码和信息匹配过程则涉及到了个体的认知带宽,以及个体受到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带宽”。在此处的信息刺激触达时大脑会形成预测加工,调动当下环境形成的生理带宽与过去经验形成的认知带宽和价值带宽进行预测,之后生成模型。

(二) 生理带宽的延展:从具身中介到多元身份认同

生理带宽中的身体在传播中起到了中介化的作用,促进了主体的空间感知和社会认知,并且在参与社会交往中发挥着文化和政治功能。在元宇宙视域下,个体生理带宽的延展主要体现在身体从物化的、肉身的存在转变为基于技术的智能身体与多元身份认同。

从4E认知理论来看,所谓的具身体现了身体的不同内涵,即“生物身体”“技术身体”“环境身体”和“意义身体”。^[30] 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的发展,在生成元宇宙的技术支撑下,“生成认知”开启了认知科学新的革命性转向。生成认知强调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动作用,认为人类作为行动者可以主动生成意义世界,认知是在大脑、身体和环境三者的动态耦合中涌现出的。^{[31] (P. 172)}

智能身体来源于对生理带宽这样的绝对带宽的技术性补偿,反映了人类自身与技术体系的深度连接。在智能身体的实践中,身体的拆解和再造表现在身体的元件,如身体状态、身体位置、情绪、人脸、声音等元件数据化。^[32]身体的元件化,一方面弥补了稀缺的生理带宽,它以特殊的方式嵌入到人类自身的经验现实中,实现了身体元数据的可测量和可获取。唐·伊德也提出在“人-技术-世界”发展的连续系统中(我-技术)→世界的变项体现了一种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33] (P. 95)}

另一方面,在媒介空间的身体实践中,身体作为行动者也扮演着中介者和转译者的角色,身体是精神、物质文化的转译者,身体能够主动建构并生成意义。智能身体成就了媒介信息的多维度感知和提取,并且进行有意识地转译,身体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着媒介信息的意义和元素。这种转译功能就体现了人对于媒介信息的积极的能动性,有望摆脱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例如,智能可穿戴设备中生理数据的识别能够识别人的生理数据,进而对人提供健康预警等信息,促使个人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不过,智能身体在促进生理延展的同时也扩张了人们的感知需求,而这种对需求的过度追求也可能造成身心的双重负担,同时,身体的元件化也可能对认知产生影响。

进一步来说,技术的具身关系也唤起了人们对技术“透明性”新的期待,即摆脱技术的参与而重新获得扩展的身体。^{[33] (P. 81)}这种重新获得的身体在元宇宙世界中体现为多重的数字化身,以及主体所建立的多元身份认同。按照元宇宙的技术期待,数字化身是从具身到离身的转换,个体通过虚拟身体在元宇宙空间中获得拟具身化的体验,由此物质身体、智能身体与数字化身三重“身体”在不同的媒介空间中得以共存。虚拟空间体验成为现实空间中行为的映射和反射,数字化身在不断的体验中重构着现实世界的行为。因此,关于生成元宇宙与数字化身的讨论还需要从化身与身体、技术身体、环境身体、意义身体的角度来思考。

例如,多重身体带来了多重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当下的物质身份认同不同,元宇宙中的个人更渴望摆脱技术的中介性,形成全方位逃逸的、游牧的主体。元宇宙中的主体是摆脱技术的中介性实现游牧的身份,还是被技术全方位的控制形成数字的存在,这还需要结合经验性问题来进一步思考。

(三) 认知带宽与价值带宽的互动: 从感知空间到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

大众传播时代仅仅是把媒介视作辅助认知的工具,不过分布式认知的观点则强调了“主体-媒介-客体”三者之间认知的协同性。对个体来说,认知扩展可能来自内部与外部两个部分。分布式认知观点的延展包括了对内部表征(如心理图式、神经网络等)与外部表征(如物理符号、外部规则等)的延展。从内部来看,心理学研究发现减少消极情绪、利用积极情绪能够延展认知带宽。

从外部来看,个人的身体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当中,正如梅洛-庞蒂提出的“空间是身体化的空间”,身体性与空间性的统一是人们获得知觉的习惯,^{[34] (P. 196)}并且身体在空间当中建构起认知与社会文化意义。元宇宙视域下,虚实融合的空间场景包括时空状态和心理氛围,这一空间不仅包括了单一的物理空间还包括心理空间与权力关系。从元宇宙空间来看,其更强调通过媒介工具与主体的协同关系来匹配和扩展认知。换句话说,元宇宙是通过特定场景下,媒介场景与主体的匹配来扩展个体带宽,这种带宽既包括了注意、情感、记忆等认知带宽,也包括思维、意识形态等价值带宽。就这一点来看,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三元模型(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从主体与媒介的关系层面出发,能够为元宇宙场景下扩展认知的方式提供借鉴。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三元模型从空间的辩证关系角度,对人的异化和身体感觉的释放提出了批判性思考。他认为空间既不是一个起点,也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35] (P. 29)}在跨媒体时代有研究者研究了这三元空间模型在媒介化社会中的演变,具体来说,感知空间强调了媒介技术对于个人的必要性和适应性,而构想空间能够实现经验的预演,最后,人们的生活空间实现了社会实践的常态化,媒介的挪用以价值带宽的形式改变了社会规范、惯例和期望方式。^[36]

就元宇宙的三重空间来看,首先,感知空间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空间生产方式对具体场所、“空间

集”的生产和再生产。感知空间是能够被人们感官所把握的具体的、物质化的空间场所。元宇宙技术扩展了主体的感官维度,通过增强现实多维度、沉浸式的感知,主体有望实现以高维的认知视角关注社会现实,并且以自身的想象和期望来编辑社会现实空间。不过,元宇宙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世界,体现为地域空间可能以镜像空间和增强现实的方式存在,赋予了个体对现实空间更丰富的行为自由度。例如,元宇宙空间中地域化的表现形式——地图,将以数字化三维交互地图呈现,其能够与自动驾驶汽车进行交互,并且自动驾驶汽车的传感器同样可以补充三维地图。

构想空间是关于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是通过权力和符号编纂构想出的概念化空间。^[37]这样的空间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不断生产和复制的关系网,能够提供一种连接。构想空间对带宽的延伸体现在媒介所提供的可供性与个人认知的结合,媒介可供性塑造了个体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并且使得其数字交往行为愈加符合媒介空间的要求。在元宇宙空间中,构想空间表现为经验的预演。感知空间的物质性以新的方式融入构想空间当中,例如身体的姿势、运动、社交手势等在构想空间中依然存在。个体在构想空间中通过游戏等方式实现了具身认知与虚拟空间的互动。拟具身化体验与情绪和注意的预先唤起实现了认知与媒介的协同,在此处媒介负载了个体的认知,使得个体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受预先在构想空间中实现。在元宇宙中情感的维系表现为数字交往中更深层次的信任与共情,在其中人与机器、人与化身、化身与化身之间的连接能够在拟具身化的体验基础上实现“准社会交往”和“媒介等同”的交往体验。这种经验性的预演在积极程度上能够帮助个体实现情绪调节、记忆捕捉和行为的延伸,但是也需要警惕认知竞争的异化,技术在与认知耦合的同时也促进了监视的自动化,更加隐蔽地实现宣传目标。

最后,这种认知与经验的预演将作用于现实生活空间,现实生活空间是一种私人的、想象的微观的空间。这一空间使得来源于虚拟世界的认知作用于现实环境,主体认知也在虚拟与现实环境中被反复修正与确认。在这一环节,价值带宽的响应性和效率性就发挥了作用。元宇宙空间对价值带宽的补偿体现在经验预演向现实空间的转化方面,由于经验预演的空间包含社会关系的再生

产,因此与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元宇宙中的关系圈层更多是基于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实现的,这些技术特征保障了公平、互惠、合作、公民参与等正向价值的实现。在此前提及的现实圈层的两种极端力量之间,技术的去中心化保障可能是实现圈层平衡的一个辅助支撑。

五、结语

“元宇宙”这一概念符号承载了人们对未来媒介可供性的想象,为人类理解未来社会构造方式提供了具象化的图景。落脚在元宇宙与个人认知的框架中,本文力图从媒介、认知与空间的路径中探索未来媒介如何重构个人认知,拓宽个体的认知带宽与价值带宽,防止媒介认知竞争逻辑的异化。与当下媒介时代不同,元宇宙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其所提供的具身交互方式使得个人的生理带宽、认知带宽和价值带宽得以重塑。而这一重塑也有望摆脱媒介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实现个体的积极认知和行为解放。认知自由与行动自由可以具体化为三重空间的数字交往,而交往的基础是身体。个体带宽的释放与积极认知相联结,过去被媒介局限的认知逐渐在三重空间中延展,媒介与个体的关系从中介化转变为协同交互。在文化层面,空间实践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底层技术有望为圈层社会交往提供平衡支点,促进公众社会参与和协作。

参考文献:

- [1][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2]张默.论麦克卢汉的“内爆”理论——兼与鲍德里亚观点的比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 [3]彭兰.元宇宙之路的近虑与远忧——基于用户视角的需求-行为分析[J].探索与争鸣,2022(7).
- [4][美]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埃尔德·沙菲尔.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M].魏薇,龙志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 [5]Franconeri S L, Alvarez G A, Cavanagh P. Flexible cognitive resources: competitive content maps for attention and memory[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3(3).
- [6]杜骏飞.“未托邦”:元宇宙与Web3的思想笔记[J].新闻大学,2022(6).
- [7]黄旦.延伸:麦克卢汉的“身体”——重新理解媒介[J].新闻记者,2022(2).
- [8][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 [9]潘忠党. “玩转我的 iPhone, 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媒体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 [10]Silverstone Roger. Complicity and Collusion in the Mediation of Everyday Life. [J]. New Literary History, 2002.
- [11]李建会, 于小晶. “4E + S”: 认知科学的一场新革命?[J]. 哲学研究, 2014(1).
- [12]张淑华, 李海莹, 刘芳. 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 心理研究, 2012(1).
- [13][美]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曹荣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4]李艳红. 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 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2).
- [15]QuestMobile. 2022“Z世代”洞察报告[EB/OL]. (2022-08-16) [2022-12-08] <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316>.
- [16]车敬上, 孙海龙, 肖晨洁, 等. 为什么信息超载损害决策? 基于有限认知资源的解释[J]. 心理科学进展, 2019(10).
- [17]程慧平, 于欢欢, 蒋星.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信息过载的前因后果模型研究[J]. 情报科学, 2023(3).
- [18]Lee A R, Son S M, Kim K K.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verload and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fatigue: A stress perspectiv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55.
- [19]刘子旻, 时勤, 万金, 等. 认知闭合需要研究梳理与未来走向[J]. 心理科学进展, 2018(4).
- [20]周鹏生. 认知偏差的产生及其与认知闭合需要的关系[J]. 心理研究, 2017(5).
- [21]Tashev B, Purcell M. & McLaughlin B. Russias Information Warfare: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Dimension[J]. MCU Journal. 2019(2).
- [22]Hatch T. & Gardner H. Finding cognition in the classroom: an expanded view of human intelligence [M]//Salomon G. (ed.).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3][法]雷吉斯·德布雷. 普通媒介学教程[M]. 陈卫星, 王杨,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 [24][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25]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6).
- [26]Cole M. A cultural-historical approach to distributed cognition[J].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1993(1).
- [27]周国梅, 傅小兰. 分布式认知——一种新的认知观点[J]. 心理科学进展, 2002(2).
- [28]Clark A. Surfing Uncertainty: 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9]朱林蕃, 刘闯. 预测心智的三种理论模型: 一个比较性研究[J]. 哲学分析, 2022(5).
- [30]苏佳佳, 叶浩生. 元宇宙与具“身”认知[J]. 心理研究, 2023(1).
- [31]Varela F J, Thompson E, Rosch E, et al.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7.
- [32]彭兰. 虚实混融: 元宇宙中的空间与身体[J]. 新闻大学, 2022(6).
- [33][美]唐·伊德. 技术与生活世界: 从伊甸园到尘世[M]. 韩连庆,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34][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35][法]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36]André Jansson. Mediatization and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for the Transmedia Age[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3(3).
- [37]潘可礼. 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收稿日期 2022-12-19 责任编辑 刘立策